

「湘潭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胡应麟 文学研究

吕斌◎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湘潭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胡应麟 文学研究

吕斌◎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应麟文献学研究/吕斌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12

(湘潭大学文学院丛书)

ISBN 7-5004-5935-1

I. 胡… II. 吕… III. ①文献学—研究②胡应麟
(1551~1602)—年谱 IV. ①G256②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6192 号

责任编辑 李 是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2.125

插 页 2

字 数 33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吕斌，男，1968年11月生于河南省许昌市。2000年毕业于广西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晋升为副教授；2005年10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2006年遴选为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现从教于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致力于中国古典文献学、明代学术史研究。

内容提要

本书全面深入地考察了胡应麟的文献学成就，澄清了诸多既往相关研究中的模糊认识和误区。“典藏学研究”主要论述中国典藏学的建立、胡应麟的典藏理论，考证胡氏藏书；“目录学研究”追溯目录学渊源，探析胡应麟的目录学思想，考证其目录学成果；“辨伪学研究”辨析辨伪学的发展源流，分析《四部正讹》产生的原因，考察胡应麟的辨伪思想及其辨伪得失。《胡应麟年谱补正》则在吴晗所作《年谱》的基础上，订正讹误，补充新材料，为胡应麟研究提供尽量丰富、翔实、准确的史料。

策划编辑：冯春风

封面设计：010-62617455

序

吕斌博士的《胡应麟文献学研究》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胡应麟对文献学的研究，下编为《胡应麟年谱补正》。作者首先通过反复、深入、细致地研读原始资料，对吴晗的《胡应麟年谱》作了补证工作，这不仅为人们研究胡应麟提供了丰富、翔实、准确的资料，同时也为作者本人从事胡应麟文献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们常说明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明代虽然也出现过杨慎、焦竑、陈第、胡应麟等著名学者，但是后人又偏偏在他们的著作中找到不少失误，于是明人空疏不学的印象终难改变。如果我们读了吕斌博士的《胡应麟文献学研究》，也许会改变这一看法。

胡应麟的学问以丰富藏书为基础，所以本书首先论述了胡应麟的典藏学成就。本书对胡应麟的藏书实践与藏书理论作了全面总结。人们通常认为胡氏藏书四万余卷，经作者考证，胡氏藏书达六万卷，并且认为六万卷之数“应该较为接近其最终藏书之数”，而非人们已经接受的四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卷。

胡应麟的藏书雄踞海内，一般都认为是他赚取金华虞守愚家藏书的结果，本书对胡应麟的图书收聚工作作了全面阐述。一是购买，他对全国各地的图书市场了如指掌，尝云：“身所涉历金陵、吴会、钱塘，皆通都大邑，文献所聚，必停舟缓辙，搜猎其间。小则旬余，大则经月，视家所无有，务尽一方乃已。”“元瑞

以嗜书故，有所购访，时时乞月俸；不给，则脱妇簪珥而酬之；又不给，则解衣以继之。”并且还“穷搜委巷，广乞名流，寻之故家，求诸绝域”。以至“书日益富，家日益贫。”二是抄录，王世贞《石羊生传》称其“手抄集录几十之三。”三是辑佚。如胡应麟收藏的《搜神记》就是“从《法苑》、《珠林》及诸类书抄出者。”正如谢肇淛所说：“求书之法，莫详于郑夹漈，莫精于胡元瑞。”

本书对胡应麟收集图书的标准与鉴定方法也作了论述，指出胡应麟收集图书坚持了适用性原则，尝云：“世所由贵重宋梓，直至与古遗墨法帖并，吴中好事悬货购访，余则以书之为用，枕籍揽观。”“有装、印、纸、刻绝精而十不当凡本一者，则不适于用，或用而不适于时也。”此外他还总结出一整套鉴定图书价值的方法：“凡书之直之等差，视其本、视其刻、视其纸、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本视其抄、刻，抄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时又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天下之书之直之等定矣。”

作者对胡应麟的藏书楼建筑思想也进行了探讨，王世贞的《二酉山房记》对胡应麟藏书楼的建筑情况专门作了介绍：“屋凡三楹，上固而下隆其趾，使避湿，而四敞之，可就日，为庋二十又四，高皆丽栋，尺度若一。”作者指出胡应麟的藏书楼充分注意到了避湿、通风、采光、便于保管与使用等原则。为便于保管与使用，胡应麟还对藏书进行了整理，其结果是编出了《二酉山房书目》，以及目录学专著《经籍会通》。

本书认为胡应麟是将藏书与读书治学相结合的典范。胡应麟对藏书家作过分类，指出：“画家有赏鉴，有好事，藏书亦有二家。列架连窗，牙标锦轴，务为观美，触手如新，好事家类也；枕席经史，沉湎青缙，却扫闭关，蠹鱼岁月，赏鉴家类也。至收

罗宋刻，一卷数金，列于图绘者，雅尚可耳，岂所谓藏书哉？”胡氏本人显然属于赏鉴家之列，他嗜书成癖，曾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于他无所嗜，所嗜独书。饥以当食，渴以当饮，诵之可以当韶箴，览之可以当夷施，忧藉以释，忿藉以平，病藉以起色。”王世贞《二酉山房记》亦云：“元瑞于书，聚而读之，几尽矣。”朱彝尊称其“不失为读书种子”。

胡应麟曾感叹某些人“富于青缙而贫于问学，勤于访辑而怠于钻研”，所以自己不但勤于藏书，而且勤于读书；不但勤于读书，而且还勤于治学。王世贞对之作了公允的评价：“世有勤于聚而倦于读者，即所聚穷天下书犹亡聚也。有侈于读而俭于辞者，即所读穷天下书犹亡读也。元瑞既负高世之才，竭三余之晷，穷四部之籍，以勒成乎一家之言，上而皇帝王霸之猷，贤哲圣神之蕴，下及乎九流百氏，亡所不讨核，以藏之乎名山大川，间以余力游刃，发之乎诗文，又以纸贵乎通邑大都，不胫而驰乎四裔之内，其为力之难，故不啻百倍于前代之藏书者。盖必如元瑞而后可谓之聚，如元瑞而后可谓之读也。”

如前所说，胡应麟对藏书理论作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较为突出的还表现在他对我国藏书规律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图籍废兴，大概关系国家气运，岂小小哉！”他还在诗中写道：“千秋大业在竹素。”其十厄论恰好说明了这一点。他在牛弘“五厄”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十厄”论：“牛弘所论五厄，皆六代前事。隋开皇之盛极矣，未几皆烬于广陵；唐开元之盛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肃、代二宗游加鸠集，黄巢之乱，复致荡然；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历，再盛于宣和，而金人之祸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元季之师至矣。然则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大业一也，天宝二也，广明三也，靖康四也，绍定五也，通前为十厄矣。”胡应麟在藏书理论方面还有一个贡献就是指出了书籍制作技术的提高促进了藏书量的增加，指出：“考昔

人书目，参以余所校讎，往往汉多于周，唐多于汉，而宋多于唐，何耶？周尚韦编，汉始侧理，唐犹传录，宋则印摹，难易之辨也。”说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对文化发展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胡应麟的藏书实践与藏书理论，都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

该书接着论述了胡应麟的目录学成就，其结论部分说：“他在目录学研究过程中强调‘史’的观念，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历代书目，并对书目的类型进行了概括；考察了目录分类体系及部类内部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类例观，从学术性的角度提出了五部分类的主张，并应用于自己的编目实践；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对一些目录学家进行了研究、评价。”其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吕斌先生指出“胡应麟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经籍会通》可谓是中国古典目录学史上一部承先启后之作。”学术界对郑樵的《通志·校讎略》与章学诚的《校讎通义》都非常重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对胡应麟的《经籍会通》的重视显然不够，本书对胡应麟的《经籍会通》作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使人们重视这一中间环节，当然极有参考价值。本书在论述过程中颇多新见，如郑樵的传世之作《通志》无疑体现了作者的会通思想，但是胡应麟却批评郑樵“短于会通”，这显然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观点，作者对此作了探讨。指出郑樵“力不副言”，“在其实践中难以做到融会贯通天下学术。”“这一评论虽有贬抑之嫌，但是基本上还是符合郑樵的学术实际的。”其次胡应麟的藏书目录《二酉山房书目》虽然已经亡佚，但是作者对该目所著录图书的数量与分类情况作了认真考证，认为该目除经、史、子、集四部外尚有一部著录类书与伪书，并且给予了充分肯定。类书在目录中通常置于子部之末，但是陆文裕藏书目序称：“山包海汇，各适厥用，然螭螭错焉，类书之谓也。”并将类书专设一类，胡应麟对此作了充分的肯定，指出：

“惟类书另录最当，与余《山房书目》同。”看来《二酉山房书目》中的类书确实另作一类，这表明胡应麟已经充分认识到类书为综合性图书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序已经认识到“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类，乃无可归。”但是又说：“《隋志》载入子部，当有所受之。历代相承莫之或易。明胡应麟作《笔丛》始议改为集部。然无所取义，徒事纷更，则不如仍旧贯矣。”本书作者批评《总目》“误认为胡应麟首先提出将类书归入集部，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胡应麟并不是认为将类书入集部，而是于四部之外别立一部。这样将类书独立为一类，不但突出了综合各种学科知识的类书的学术特点，而且将便于分类编目与检索。”此外，胡应麟还提到“总为伪书一类，另附四部之末。”无论伪书是否在《二酉山房书目》中另立一部，都“表明胡氏在图书辨伪方面已经获得了突出成就，同时也表明了胡应麟试图突破四部分类法，欲四部之外别立门户的思想”。“胡应麟首次提出将伪书总为一类附于四部之末，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与其辨伪学思想密切相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评论胡应麟研究历代书目的成果时，作者能依据史料作出全面而客观的评价，既充分肯定其成就，又指出其不足之处。仅举一例，如谓：“至于胡应麟所说：‘至唐大盛，于是史居子上次经，佛、老附子次史，而终以集，定为四部。’则是失考，原因是胡应麟未能见到李充的书目，所以才会有此失误。”作者在分析时心细如发，例如作者通过对二级类目的比较来说明一级类目名称的变化就足以说明这一点：“《隋志》对《七志·经典志》的著录内容记载得很清楚：‘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而《七略·六艺略》的著录内容仅有‘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并无史记、杂传二类。王俭正是认为《七略》‘六艺’之名不足以概括包括史记、杂传在内的

这一类文献，遂改‘六艺’为‘经典’。‘经典’一词，在王俭看来，是一个能够范围六艺、小学、史记、杂传的概念。”胡应麟对书目的著录项目也作过研究，本书对此也作了介绍，如同名异书现象，作者分析道：“胡应麟列举了同名异书的例子，并分析了其原因。书名存在如此复杂的情况，观者仅从这些书籍的书名是看不出书的内容性质的。因此，在考察书籍时，不但要看书名，而且要看内容。”

梁启超称胡应麟是辨伪大师，并指出：“专著一书去辨别一切伪书，有原理有方法的，胡应麟著《四部正讹》是第一次。”本书专设一章论述胡应麟的文献辨伪成就，作者首先从文献辨伪史的角度来确定胡应麟在文献辨伪方面的成就与地位，指出：“胡应麟《四部正讹》的问世，是中国辨伪学史上的里程碑。在他之前，人们的古籍辨伪仅仅是一种实践性的活动，还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胡应麟是第一位以辨伪为专门之学的学者，他不但将考辨伪书的范围扩大到经史子集四部，而且，他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伪书的种类、分布情况，第一次提出伪书的特征以及考核伪书的方法等理论，从而确立了辨伪学的理论基础，为后世的辨伪提供了理论根据。至此，中国古籍辨伪学成为一门独立的专科学问，胡应麟可谓中国辨伪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接着，本书对《四部正讹》产生之原因进行了条分缕析，可谓朗若列眉。此外，作者还详细而深入地论述了胡应麟对伪书种类的总结与对辨伪方法的总结，颇有参考价值。例如，胡应麟云：“凡核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可见查目录对了解一书的来龙去脉是多么重要。但是该书又特别指出胡应麟已注意到目录有阙载现象，要我们在利用目录辨伪时留心这个问题。如胡应麟指出：“南渡以还，书多端临《通考》所未载者。余所见小说家如《西溪丛语》、《癸辛杂识》等不下数十种。而马氏所据大率本晁、陈二家，自余宋末诸人所著或未及行世，

《通考》虽成于元世，其时兵革动勤，无缘掇拾，今承平日久，故渐出人间，不得以为伪也。”这对我们正确利用目录做辨伪工作无疑是极有帮助的。

本书还专设一章讨论胡应麟辨伪实践之得失问题，在肯定胡应麟辨伪成绩时，注意运用新材料特别值得称道，如谓：“在这段考辨中，胡应麟认为《孙武》、《尉繚》不是伪书，而《吴起》虽未必吴起自著，或为战国人掇其议论成编，但亦非后世伪作，都甚有见地。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竹书，有《吴孙子》、《齐孙子》、《晏子》、《尉繚子》、《太公》等，证实了胡应麟认为《孙武》、《尉繚》不伪的正确性。”该书指出胡氏辨伪之失也颇为中肯，如云：“胡应麟在对待《尚书》真伪问题上，反映出儒家正统观念对他的影响，表现为对《尚书》的盲从不疑，这种观念上的问题是无法用现实的方法补救的。”

明代是中国学术史、中国文献学史的重要环节，相对来说研究得少一些，吕斌先生有志于从事明代文献学研究，本书可谓开了一个好头，循此继续辛勤耕耘，眼前将会出现无限灿烂的前景。

徐有富

2005年1月24日于问津阁

目 录

序	徐有富 (1)
绪 论	(1)

上 编

第一章 胡应麟典藏学研究	(19)
第一节 典藏学的建立	(19)
第二节 胡应麟的典藏实践	(23)
第三节 胡应麟的典藏理论	(36)
第四节 “藏书家”小识	(76)
第二章 胡应麟目录学研究	(83)
第一节 胡应麟目录学的学术渊源	(83)
第二节 关于《经籍会通》和《二酉山房书目》	(89)
第三节 对历代书目的总结与评鹭	(100)
第四节 对郑樵《通志》的评价	(114)
第五节 对类例的总结及其类例观	(129)
第三章 胡应麟辨伪学研究	(161)
第一节 辨伪学源流论略	(162)
第二节 《四部正讹》产生之原因	(174)
第三节 对伪书种类的总结	(181)
第四节 对辨伪方法的总结	(189)

第五节 胡应麟辨伪实践之得失	(200)
第四章 吴晗《胡应麟年谱》考述	(216)
结 语	(231)

下 编

《胡应麟年谱》补正	(235)
参考引用文献	(367)
后记	(376)

绪 论

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一字明瑞，尝自号少室山人、石羊生、芙蓉峰客、壁观子。浙江兰溪人。明嘉靖、万历年间著名的文献学家、藏书家、文学家及文学批评家。在当时空疏学风盛行的情况下，胡应麟毅然提出了做学问要“博而精”的主张，并身体力行，因而，在当时便以学识渊博而与杨慎、陈耀文、焦竑等人齐名。他在读书过程中能够做到精读深思，善于总结和发现问题，故常有发前人之所未发之论。如在《经籍会通》中，他有许多关于文献学方面的独到见解，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文献学方面的线索和资料，对后人的文献学研究有相当的启发和借鉴作用。对于他在文学、史学、古典文献学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实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儿时的胡应麟便聪颖过人，并表现出对文学特有的敏感与兴趣。“幼能诗”^①，“五岁，宪使公令出侍客，客占对必属”。^②九岁时跟随老师习经生业。但是，章句的繁琐使他感到厌薄，于是他便从父亲胡儁处找来“《古周易》、《尚书》、《十五国风》、《檀弓》、《左氏》及庄周、屈原、司马迁、相如、曹植、杜甫诸

① 《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传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82页。

②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八十九《石羊生小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家言”^①等阅读，从此他的一生与书籍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缘。十三四岁时，胡应麟以诗名而闻名里中。十五岁时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华阳博议》。嘉靖四十五年丙寅（1566），十六岁的胡应麟开始了他的游学生活。跟随着父亲，胡应麟游历了祖国大江南北的名都大邑，“所至兴会感触，一发于诗”。^②这段时间的游学，使他不但结交了许多当时的巨儒名士，增长了见闻，开阔了眼界，而且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对胡应麟而言，仕途却似乎与他无缘。万历四年丙子（1576），已经二十六岁胡应麟才考中举人，从此之后便再与科举无缘。据史料记载，胡应麟曾五次赴京参加会试，其中前两次下第，后三次则是因病而废，故一生未仕。仕途的失意反而使得嗜书好学的他有了充足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读书与著述。胡应麟对书籍的热爱是令人钦佩的，他“筑室山中，后先购书四万余卷”，“旦夕坐卧其间”^③，与书为伍，尝自言：“于他无所嗜，所嗜独书。饥以当食，渴以当饮，诵之可以当韶頀，览之可以当夷施，忧藉以释，忿藉以平，病藉以起色。”^④《四库全书总目》云：“明自万历以后，心学横流，儒风大坏，不复以稽古为事。应麟独研索旧文，参校疑义，以成是编。虽利钝互陈而可资考证者亦不少。朱彝尊称其不失读书种子，诚公论也。”^⑤正是由于胡应麟能够做到不为当时世风所囿，致力于学术事业，所以他一生著述颇丰，可谓著作等身。尽管他的许多著作已经亡佚，但今

① 《少室山房集》卷八十九《石羊生小传》。

② 《少室山房集》卷八十九《石羊生小传》。

③ 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3页。以下凡引《少室山房笔丛》皆简称《笔丛》。

⑤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三《少室山房笔丛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63页。以下凡引《四库全书总目》皆简称《总目》。

天能够读到的仍有《诗薮》二十卷，《少室山房集》一百二十卷及《少室山房笔丛》四十八卷等。由于学问渊博，胡应麟在当时便受到人们的推崇，上至达官贵人、文学大儒，下至社会上的三教九流都愿与之交往。“诸词客裹粮入婺者踵相接，皆以事弇州、伯玉者事之，莫敢异词。”^①

胡应麟的一生，可以说是游学、求书、藏书、读书、著述的一生，因而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吴晗在《胡应麟年谱》中对其著述已经进行了总结，此不再赘述。从现存的资料来看，《少室山房集》一百二十卷主要收录其文学作品。《诗薮》二十卷，内编六卷，分论古今各体诗；外编六卷，以朝代有序，评论自周、汉至元各代诗歌；杂编六卷，主要是补遗与考证；续编二卷，评论本朝自洪武至嘉靖年间的诗歌。此书宏征博引，收集记述历代诗人诗歌情况较丰，对于认识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学思潮，对文学史与文学理论史的研究均有较大资料价值。学术考据笔记《少室山房笔丛》四十八卷，分为十二部分，《四库全书总目》云：“《经籍会通》四卷，皆论古来藏书存亡聚散之迹；曰《史书占毕》六卷，皆论史事；曰《九流绪论》三卷，皆论子部诸家得失；曰《四部正讹》三卷，皆考证古来伪书；曰《三坟补遗》二卷，专论《竹书纪年》、《逸周书》、《穆天子传》三种，以补三坟之缺；曰《二酉缀遗》三卷，皆采摭小说家言；曰《华阳博议》二卷，皆杂述古来博闻强记之事；曰《庄岳委谈》二卷，皆正俗说之附会；曰《玉壶遐览》四卷，皆论道书，曰《双树幻抄》三卷，皆论内典；曰《丹铅新录》八卷、曰《艺林学山》八卷，则专驳杨慎而作，其中征引典籍极为宏富，颇以辨博自矜，而舛讹处多不能免。”^② 所论虽不够精确，但大抵是

① 明·吴之器：《婺书》卷四《胡元瑞传》，清刊本。

② 《总目》卷一百二十三《少室山房笔丛》，第1063页。